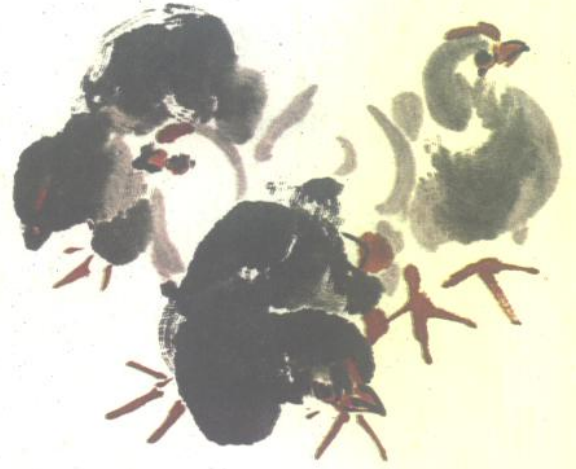


成美
画



17

花城出版社

隨筆

10/10/17

隨筆

第十七期



随 笔 丛 刊



第十七期 目 录

玫 瑰 园

士与知己	司马玉常	1
焦裕禄的悲剧	南 丁	3
从列宁的一张画像谈起	张光昌	5
谁持“真迹”？	王国荣	6
禅宗的“杀佛”和牛顿的皈教	张 禹	7
“同志”小议	马 良	9
哲学曾使我糊涂	木之青	10
我的爸爸董必武	董楚青	12

人 物 记

老舍的风格	碧 野	18
在美学老人家里作客	白 夜	21
秋瑾亲友轶闻	胡安权	24

往 事 漫 忆

李富春同志指导我写作	陈学昭	26
破天荒的事	陶 雄	28
枯柏重青 ——忆社会学家陈达教授	黄伟经	30

诗 文 漫 步

谈艺术的抽象 ——文学创作杂记	高行健	34
--------------------	-----	----



骂人的戏及其它	荆莘	37
人物语言纵横谈	陈炳	40
爱情不等式(二则)	晓江	43
艺苑剪翠	沈默	45
闲话“一只脚站着写作”	石峰	48

读书与思考

“带头书记”与“天门卫星”	郭丽鸿	50
钱神絮语	牧惠	53

文史荟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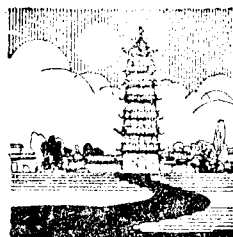
古人的诨号	孙恒年	56
抢来的老婆	陈炜湛	57
改革和创作	高晓声	59

生活之歌

锻炼	高光	63
葡萄祭	高红十	67
流泉淙淙	刘天明	69

五湖四海

阿曼归来	高福源	70
英伦风情	蓝单车	74



港澳随笔选

旅欧剪影	[香港] 刘锦庆	76
丝路之旅	[香港] 张君默	80
在列宁那里作客	[苏] 绥拉菲摩维支 著 范信龙 译	82
气功趣谈	白 沙	85
羊城飞雪	杨宝霖	89
象的趣闻	绿 星	91
碎玉集	袁 云	2
“金牌”小议	欣 原	29
墨 星	张小红	20
名臣之女——林敬纫	安 然	47
珍妃和她的“死别词”	麦文峰	42
诙谐幽默的米芾	文 华	49
福 气	洪 治	66
工间休息小景	洪 治	73
诗与谜语	张 浪	81
“独占鳌头”和“桂冠”	· 晓 ·	90

美 术

封面画	关山月
封面设计	谢顺景
封二 博贺渔港一瞥(速写)	伍启中
封三 水乡行(速写)	苏 华
内文插图、题图、版花	梁培龙 卢廷光 梁卓舒 苏家杰
	郑先梅 苏小华 万小玲 梁蓝波
封面题字	茅 盾

士与知己

玫瑰园



司马玉常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曾经被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总之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这，要算是批得较为文明而且客气的了；有人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划到“右”边，吃了二十多年的苦头。

我实在没闹明白这话错在哪里。

如果说：“士不为知己者死”，或“士为不知己者死”，或“士为知己者不死”，才能叫做左，也就是正确；那么，这样“正确”的“左”话实在有些出奇，有些近乎说梦，叫神经正常的人难以索解。

如果说，这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的语言，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不该拿到社会主义时代来说，说了会叫人想到封建社会，甚至思想会退回到封建社会去……。那么，我们就只好都变做一言不发的哑巴，因为我们所说的话，如果追根究底，则不少正是来自封建社会，甚至还要早些年月的原始社会。山水日月之类的简单

语言且不去说它，就是“愚公移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时常听人在说在用，深考起来，似乎并非今天的创造，而确实来自封建社会，甚至封建士大夫之口。为了“划清界限”，以示阶级觉悟之高，那就只好单说说“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超级语言，也许可望“一贯正确”下去的吧！

去西德、荷兰出访三月的外科专家邝公道教授日前回到了广州。这类事今天已非罕见，而《羊城晚报》发了头条消息，且附以短评，因为确有发人深省的地方。一九四六年，这位教授放弃了柏林创伤医院外科主治医师的职务回国服务，作出过出色的贡献。然而，因为是“士”，终于在“劫”难逃，成了十年悲剧的一名主角：抄家、游斗、监管，直到坐牢！“罪名”之可笑近乎儿戏——因为从国外回来，所以叫做“特嫌”。总而言之，左右一折腾，邝教授遂萌去志，而且去志极决。这，似乎也算“可以理解”的吧？但这次邝教授出国三月，定居西德的儿女、老同学都曾劝他留下，他却回志甚决，而且出乎某些看人三十年一贯制的眼光之意料以外，他竟如期归来，因为“中国还是我自己的中国”！“过去是左倾路线把我推出去，现在党的正确政策把我召回来。”“党这样信任我，我是不会背信弃义的。”

这便是：士为知己者死。

又有什么不好呢？你待他真心，他对你诚意，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好反其道而行之的吧？“维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美好的感情；至于违背这一许诺，则难免受到谴责。

邝教授身为外科专家，学有专长，且成绩卓著，自应受到格外的照顾，因而知遇图报，或者说思想觉悟提高，均无不可。而我由此所想到的，则是许许多多默默无闻地埋头在自己岗位上的“士”。他们也许终其一生，也未能

碎玉集 袁云

竹

人们常常喜欢捻紫嫣红的百花园，我偏爱雨中竹林。远看，含烟吐雾；近瞧，青翠欲滴；侧而倾听，吟雷啸雨。

它，扎根大地，吸饮清泉，终生不慕奢华，不思淫逸。始终是：清瘦且直，朴实无华。

它，出土便有节，一生挺拔刚劲，不屈不挠。纵然土冻冰封、石压沙阻、曲折坎坷，它从不甘心蜷缩于地下，而是时时思长，日日向上，终于「头顶顽石起，破土根根出」。

它，从不单生，有竹成林。「苍苍弥四郊，芸芸入碧霄」，便是竹的集体之美，众生之秀，团结之花！

竹啊，生，净化空气，点缀春天；死，为人类捐躯。无论是做竹竿，做笙笛，做箩筐……，都心甘情愿，慨而献之。

铁心草

铁心草，有什么好？整天静静地编织绿色的长堤，既无迷人的芳香，又无窈窕的身姿。

每当咆哮的洪水冲来，才发现你平凡中有着伟大的品质：你死死地抱

着坝，紧紧地护着堤，不许洪水吞噬，不准狂澜撞击！

铁心草啊，你是河岸的铠，大坝的甲，长堤的盔！

小草

绿茵茵，细绒绒。象绿色的轻纱，象少女的碧裙，象护山盖地的青毯。

你在植物界纯属小字辈，不珍，不奇，不稀，不贵。但你深知的价值，死的意义。生，养活牛羊；死，养肥土地！

狂风可以把大树拦腰吹断，可是对你却无能为力。因为你一生紧紧地抱着大地。

绿绒绒呵，细密密……

无花果

难怪碧桃见了你，脸羞得绯红，绯红，因为它只开花不结果。而你，虽不见鲜花夺目开，但见累累果满枝！

其实，无花果并非无花。那一朵朵隐于花托内的单性花，不就是你的美吗？然而，谦虚的美德却使你不愿声张、炫耀。你说你最看不惯碧桃，本来自己终生无桃，却偏偏吹嘘自己是：「碧桃，碧桃」。

是的，你，生来就不靠虚名藻饰自己，更不用漂亮的空话装璜自己。

作出什么特殊的贡献，却的的确确作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也就是有一分热，发了一分光。要求通统优礼有加，各予宽敞住房一套、皇冠房车一乘，是既不现实，也不合理的，神经正常的“士”们也不会有此奢望。他们唯一希求而且重视的，不过是两个字：知己。——用邝公道的话来说，也就是“人总是要互相信任的”。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然而，谈何容易。不懂得或不愿懂得关系学并且耻于谄拍的普通之士，对此尤有深切的感触。浩劫之年，固然堕入阿鼻地狱；拨乱之后，不也有被追打乃至捆绑的教师么？为人师表，“士”之一

也，然而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仍然不过是个“教书匠”而已，即便他自己，以及他的子女都少不得“教书匠”的“教育”。

诚然，辜负了信任的“士”也是有的，知己也是相互的事，所以，“士”们自己似乎也可作点反躬自省：一不要老是埋怨，二勿须只是向对方苛求，三也不必把自己看得与别人太过不同。总而言之，要当得起人家的信任；无负于知己者的引为知己。

于是，我颂歌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认为它是做人，尤其是做士的一种美德。至于以革命为前提，我想是可以不消说了吧？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焦裕禄的悲剧

南 丁



他冒雨踏勘水的流向。在狂风大作时，他去探查风口。他到盐碱窝去，总结群众治理盐碱地的经验。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横行兰考大地，他建议成立了防治三害办公室。他身先士卒，和兰考三十多万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向三害进军。

他率领县委成员，雪夜去火车站劝阻逃荒的人们，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他和干部促膝谈心，振奋他们的精神，要以在灾区工作为荣。他走访了千家万户农民的茅屋，问饥问寒。他的足迹遍及兰考。

他在兰考工作了两年多，就因病永远离别了他所爱的兰考人民。他逝世时才四十二岁。兰考人哭他：“焦书记，你是为我们累死的呀！”

他品德高，心灵美，作风艰苦，联系群众。他无愧于共产党人的称号。他真正是县委

书记的好榜样。

一九六六年的二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我从郑州带了一辆自行车，沿着焦裕禄的足迹，在兰考整整采访了三个月，积累了五本素材。从基层干部的言谈中，我进一步认识了焦裕禄；从农民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们对焦裕禄的不尽的怀念。有一个细节，我至今不能忘记：焦裕禄有一次下乡工作，在小宋公社宿夜，疲劳过度，以致小便失禁。我在我准备写的作品构思中曾经写道：至少要做到有一根血管与英雄相通，才能谈到写英雄。我是努力把那段采访生活也做为对自己的灵魂净化而度过的。

整个采访计划还未完成，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就来到了。当然什么也写不成。我也再没有机会到兰考去。但对焦裕禄曾经战斗过的兰考的命运，我却是时时关注的。

多年来，在郑州，或是出差到外县，不时会遇到乞讨者，我问：

“你是哪里的？”

“兰考的。”

每逢听到这回答，我的心就紧缩起来。

不少朋友也都讲过类似的情况。

焦裕禄，你毕竟没有劝阻住这些寻求温饱的农民呵，他们依旧要饥肠辘辘地在城镇街头乞讨呵。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七七年底，河南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贯彻学大寨座谈会的精神。我去会议采访，找到了新任的兰考县委书记。他讲了兰考的情况。兰考是被命名为大寨县的。这个大寨县粮食单产三百余斤，离“纲要”还远得很。国家每年都要向这个所谓大寨县统销上千万斤粮食。农民依旧有离乡背井乞讨在外的。这位新任县委书记认为，十年浩劫对兰考的破坏是很严重的，从县委起各级干部把焦裕禄的精神丢掉了。他们新县委在焦裕禄墓前发了誓，决心继承发扬焦裕禄的精神，把兰考建成真正的大寨县。

等了两年，并没有听到很好的消息从兰考

蚌

当你赞美光芒四射的珍珠时，是否想到悄然生存在河床海底的蚌！

从外表看，蚌不象珍珠那样璀璨夺目，但是，蚌却是珍珠的“母亲”。蚌用自己的血肉和乳浆养育珍珠，尽心尽力，含辛茹苦，一旦珍珠育成，她又毫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慷慨献出。当珍珠在人间放射出奇异的的光芒，派上各种宝贵的

用场，蚌并不因此居功自傲，到处炫耀，仍然默默地养育她的新一代“儿女”。

这就是蚌的精神！蚌虽然表面无光，但是，她的温厚朴实，纯洁无私的心灵之光，不是照样光彩照人吗？

（陈周明）

传来，有时还会在街头碰见从兰考来的乞讨者。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消息终于传来了，是在一九八〇年的秋天。兰考实行包产到户，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问题。河南省省长刘杰亲自到兰考做了实地考察，证实了那里的情况。包产到户，兰考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不吃国家的统销粮了，不外出乞讨了。《河南日报》发了头条新闻。《人民日报》吴象论述包产到户的长篇文章《阳光道和独木桥》，举了兰考的例子。我没有去兰考看。但我相信省长的考察，相信报纸的报道和文章，是很为之振奋的。

有人议论说，焦裕禄没有解决的兰考问题，包产到户解决了。包产到户比焦裕禄厉害得多！

乍听到这种议论，我在感情上很有一点别扭，以为这是对焦裕禄的不敬。

振奋之余，别扭过后，面对现实，不得不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不得不承认这种对焦裕禄颇为不敬的议论，竟是颇有道理在。

是呵，焦裕禄同志，你被派往兰考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你带去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精神，你带去了坚决刹住所谓单干风（即包产到户）的精神。从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你是否也干了一点蠢事呢？这没有什么奇怪吧？英雄人物如焦裕禄者，也是有他的历

史的和时代的局限性的。

怎么能说焦裕禄不是全心全意为兰考人民服务的呢？他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兰考人民。兰考人民永远怀念他。然而，真正把兰考人民从饥寒中解救出来的是什么呢？恰恰是焦裕禄当年要刹住的包产到户。历史的辩证法竟是这样的无情呵。现在看来，这很好理解，因为兰考那里生产力的水平适合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形式。兰考的农民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向前走的。

这可不可以说是焦裕禄的悲剧呢？

这仅仅是焦裕禄个人的悲剧吗？

我们应当学得聪明起来。

我们已经变得聪明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就传来了这种信息。一九八〇年秋天，中央关于农业的又一个文件，更加证实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大有增长。生产发展，经济活跃，生活改善，农民高兴，四化有望，真正叫人振奋。

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非常可宝贵的，应发扬光大。但光有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经常倾听和尊重实践的声音。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少一些曲折吧？！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镇江旅次。

从列宁的一张画像谈起



张光昌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勒，曾以《列宁和示威游行》的绘画获得头等奖的画家勃罗茨基，在回忆为列宁画像时，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述：那是在彼得格勒乌里茨基宫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后，勃罗茨基乘空把一张列宁的素描像递给列宁，请他签名。列宁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这张画不象我。”而周围的人一看却说很象，并说列宁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面貌。列宁听了微微一笑，勉强签上了自己的名，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我所不同意的东西上签名。”过了一会，别人再传看这张画像时，又都说，这张画抓住了列宁的特征，画得很成功，列宁于是又反复看了看，说道：“噫，似乎真的很象。”

当我们读着这段趣事时，有谁不为列宁

坦直、爽快而又诙谐的性格发出会心的笑声？从“不象”到“似乎真的很象”的看法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看到人民领袖和人民融洽相处的亲密关系，而且也能深深体会到列宁是具有怎样的注重倾听群众意见、勇于修正自己看法（哪怕原是多么固执的看法！）的可贵精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人民的杰出领袖，他也不可能在生活中时时处处洞悉一切，毫厘不差。比如鉴赏自己的画像，据知列宁对自己的相貌历来不大经心，对此他比较缺乏调查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画家为他作画，起初，列宁的结论不够公允，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后来，经过群众的鉴定，自己的认真审视，列宁终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么！在这里，我们难道会因为革命导师也曾改变看法而觉得其伟大形象受到损害吗？恰恰相反，唯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切地感到列宁是一个普通的人，从而倍增对他的信赖和敬爱之情。

有一位老同志说得好：“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广大人民之所以尊敬、爱戴自己的领袖，不是因为他们头上戴着灵光圈的偶像式的神，而是因为他们扎根在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善于总结人类历史斗争的经验教训，带领人民，并和人民一起前进的人。他们是伟大而平凡的。列宁生活中一张画像的小故事，也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谁持“真迹”？

王国荣



《梦溪笔谈》中有一段轶闻发人深思：

任北宋枢密院直学士的李世衡，是位书法收藏家。他珍藏一卷晋代书法家的真迹孤本，被一位姓石的地方官的好友借去欣赏。不料，此位石兄乃利欲熏心之徒，竟偷偷临摹一本，以贗乱真，献给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文彦博也酷爱书画。一日会客，他将这本临摹得颇高明的贗品出示来宾，宾朋击节赞叹，唯有李世衡大惊失色，叫道：“此帖乃我所藏，为何至此？”他急忙令随从把家中藏本取来，展示文彦博及众宾客，让他们鉴别真贗。俗话说，只怕货比货。真贗一对比，贗品便破绽百出了。但是，更出乎李世衡意料之外的是，文彦博的宾朋个个怒不可遏，众口一词地斥责李世衡以“摹本”假冒“真迹”！李世衡浩然长叹：“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说，今天方体会到自己地位的低微！”

录这段轶闻的北宋科学家沈括，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与很高的文学造诣，他勇敢地以随笔为武器，向人显言贵的不合理现象挑战，寥寥几笔，把那伙投上司所好的宵小之徒的神态、心理，描绘、刻画得入木三分！

“人微言轻，理自当尔。”李世衡同时代的苏轼这样说过。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使长官特权、趋炎附势的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至今仍有市场。一个“长官”的不切实际的“西水东调”的指令，可以挥金如土，使千百万人几年的劳动白白耗费掉，使地位低微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坚持实事求是的干

部、科技人员，蒙受数年不白之冤，而吹喇叭、抬轿子的官运亨通；原石油部的几个大人物可以“凌驾”科学规律之上发号施令，把七十二人命视为儿戏，把数千万元轻易地抛进大海，而附庸高调、跟着搞假大空的，则不乏其人。试想，只要有那么一点民主作风，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使干部、专家、群众的意见，能被当作一回事认真考虑，那“西水东调”、“渤海二号”之类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开始敢于刑上大夫，认真处理了“西水东调”、“渤海二号”事件，人心大快。但大快中仍有所感，就是刑法还办不到马屁罪，对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目前还只能让群众在自己的心目中去评论、批判。确实，至今还有那么一些人，其精神状态很象当年的文彦博的宾朋。他们唯“领导眼色”行事，当领导的指示精神同客观实际发生矛盾，同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不合，他们往往不敢、也不想辨真贗，他们总是习惯地把上级的东西当作“真迹”，却把悖谬之言压下去，并扣以比“贗品”大得多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在上即金口，权大即玉言。这些人读一读《梦溪笔谈》这段轶闻，也许会出一身冷汗的。

我觉得这段轶闻，对各级领导人说来，要警惕那些投人所好之徒将摹本冒充真迹，把真迹打成贗品。这就需要深入实际，倾听群众的呼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绝不能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对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来说，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不怕位卑言轻，要坚信：真迹不会变成贗品，真理终会战胜谬误！



禅宗和牛顿的皈教 的『杀佛』

张 禹



玫瑰园

近来常有朋友闲谈中提到现代迷信的问题。我想，凡迷信总是有宗教色彩的，或者说最高形式就是宗教。因此，就不禁想起一段宗教史上的故事：

唐朝出现的禅宗南宗猛烈攻击印度传来的佛教教义和僧徒的造寺拜佛，可说是十分彻底的。如宣鉴禅师（慧能六世法孙）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是守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另一个同时的禅师义玄也说：“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孽。”他教人“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认为这才是“大善知识”的人。——所以在其他佛教徒看来，禅宗南宗的这种言论，无异于猛火，要把整个佛法都烧毁了。

其实，事情还有另一面。在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取木佛像焚烧取暖的那个时代

里，他的同辈怀海禅师就在百丈山上创立《百丈清规》。这套中国式的新戒律到北宋时推广到全国，其他宗派的寺院也先后都变成了禅宗的寺院，即通称为“禅寺”。这种禅寺在旧中国极为普遍，是不能不归功于历代禅宗大师把印度传入的佛教加以中国化，因而更易于为中国信徒所接受的。不用说，当初义玄的“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口号，早已收起了。

我没有研究过佛教的历史和经义，手头也没有有关这些高僧的资料，无力对这些问题作科学的深刻评价。不过我想，禅宗南宗从“杀佛”“杀祖”开始，终于建立更多的禅寺，弘扬了佛法，可以叫人懂得两个道理：一是在那个社会，上自封建朝廷，下至小民百姓，都需要宗教；即使佛祖都被杀光打倒，也会有人立刻造出新的一批来。二是这些禅宗大师本身也是佛教徒，他们的宗派教义为“我即是佛”，以我之佛反对他之佛，以一种唯心论反对另一种唯心论，其结果当然只能如此。

共产党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反对任何的迷信。但是说来奇怪，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以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为代表，曾鼓吹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连高尔基都曾一度 and 这帮“造神派”接近过。我们很难设想，他们究竟有什么办法真能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并且究竟怎样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的”神来。但他们至少提供了某些可能的“理论”或根据，暗示出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有人会企图创立一种“社会主义的”宗教，或者甚至有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果然，在战后苏联，个人迷信达到很可观的高度；而六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出现了，甚至在“造神”的规模和礼拜“清规”方面都较之古代宗教毫无逊色。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上的曲折迂回，也决不是个别人一手办得到，是离不开相应的

群众基础的。就现代中国的造神运动来说，固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蛊惑、煽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一小撮之所以得逞于一时，却又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根源。现在大家都容易理解，封建主义的东西早在中国存在几千年了；而对领袖人物的歌颂又多半是出于群众自发的朴素感情，它同时表达了群众的革命激情和觉悟程度。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我国最广大的群众是农民，不少还是文盲，要求他们把宗教迷信色彩彻底地从朴素的阶级感情中清除出去，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我还亲眼看见，安徽的某些集镇上春节出卖的红纸上写着“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被许多农民买回家里挂在中堂，焚香供奉。这五个大字，似可作为一种宗教的形象化图解。而那当中的“君”字改为“国”字，既显得极其勉强，又掩盖不了“君”字的思想痕迹。如果不是存在这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土壤，林彪发明的那一套朝夕祈祷的仪式，怎么能在九亿多人口中盛行一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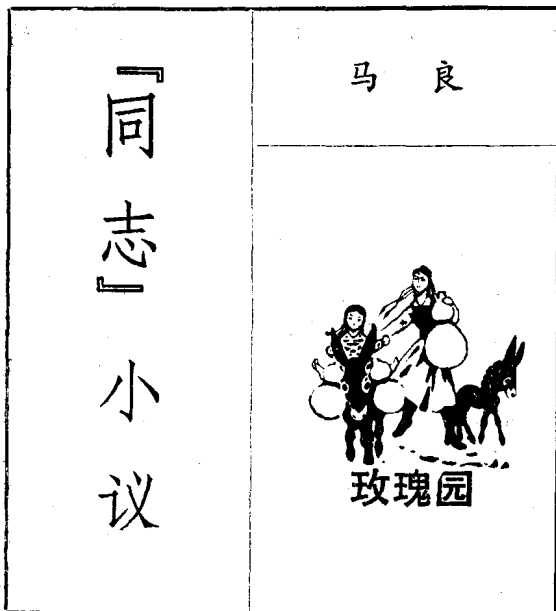
不错，从“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在现代迷信的发生和发展以至最后泛滥成灾的长过程中，你，我，他，所有自称为无神论者又怎么样呢？固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的，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坚持了科学和民主，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战斗，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更多的人，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各种方式给造神运动提供了方便或同情，只是到了后来才猛然醒悟过来。事实正是这样，只要哪里还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念或其他陈腐保守和愚昧意识，哪里就会出现信仰主义、僧侣主义和封建神权观念，一切原来是正确的事物也就可能转化而成为新的神，如同原始社会的人们把飞禽走兽这些实物幻化成为图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狂热，从形式上看好象是彻底革命、破坏一切偶像，实质上却完全相反。

不是神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倒是人照

自己的模样创造了神。任何神，包含现代的造神，都植根于现实世界的土壤之中。所以归根到底，必须改变现实世界的状况，才能把一切封建迷信连根地彻底清除掉。但这决不是说今天还无法破除迷信。早在上一个世纪，恩格斯在总结了当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就指出：“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在这里，能容得住什么迷信、僵死的东西吗？可惜，“五四”时中国人欢迎的“赛先生”（科学）还没有完全深入神州赤县，至今还不能说已经与广大群众结成朋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另一处还说到“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这是非常饶有趣味的：“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神甫赛奇虽然以合乎教规的一切荣誉来恭维他，但是绝对无条件地把他完全逐出了太阳系，只允许他在关系到原始星云的时候还有一次创造行为。……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他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还允许他存在，只是因为必须有一个对这一切事物（对自然界）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的人！……”也就是说，“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这些信神的科学家们，他们在科学上的每一个成果，不是比他们的迷信思想本身以及禅宗大师叫的“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口号，强有力得多吗？那么，如果科学家牛顿从上帝统治下夺取了太阳系之后，出于对上帝的虔诚和感情上的需要，就让他去撰写他的《评但以理书和圣约翰默示录》，去向上帝默祷吧，只要那个上帝不再来干涉太阳系的事务就行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党内一律称同志，至今已经两年了。实行得如何？不必我多说。

称呼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称呼亦然。一边是“大人”、“老爷”、“太太”，一边是“小人”、“老奴”、“丫头”。一九一二年二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孙中山即

明令各官署，嗣后官厅人员一律取消“大人”、“老爷”的称谓。结果是取而不消，“大人”、“老爷”又叫了三十七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销声匿迹。从此响起了“同志”的热情呼唤。

然而“同志”的呼唤终于又沉默下去，“科长”、“处长”、“部长”、“厂长”的称呼越来越响亮。有些领导人自称为人民的公仆，但就是不乐于人家称他“同志”，仿佛一称他“同志”，就是小看了他，不尊重他。显然，这是中了封建等级观念的余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年了，虽经党中央三令五申，而“同志”的称呼也还风行不起来，可见一代新风的树立何其不易！

方成的一幅漫画，画了个官老爷坐着大轿出巡，老百姓跪下磕头，口称“老爷”。官老爷从轿里探出身来，说：“不要叫‘老爷’，叫‘公仆’！”这幅漫画真令观者忍俊不禁。由此可知，称呼什么还在次之，关键在于是否有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连别人称他“同志”都有所不满的人，恐怕也难有为民公仆的思想，他老记着的也许是“××长”。在他看来“长”和民是两个等级哟！

我想，只有“公仆”和“主人”在事实上真正平等的时候，“同志”的称呼才能普遍实行，显得亲切而有意义。

江帆（木刻）

涂稚华作



哲学曾使我糊涂



玫瑰园

木之青

读书，是为了吸取精神营养。英国著名学者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微；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就一般意义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明了各类书籍的“营养”价值。但是由于人们的胃口不同，对各类“营养”的胃感也就不同，甚或相反。如对菠萝蜜、番石榴等等，有人垂涎，有人作呕。读历史确能使人明智，但有的人读了《资治通鉴》却学到了权术。学哲学本来使人聪明，所以哲学又叫“聪明学”，但有些人却越学越糊涂。笔者曾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学到一些哲学术语，免不了要在人前显示一番，这本来是无罪的，然而却招来了无情的打击——真活该！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我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坐牛栏、唱牛歌、戴高帽、挨批斗、服劳役、交代罪行……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一言难尽。

我是怎样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呢？问题出在讲哲学上。在那个极左思潮统治的年月，哲学是强者的工具，手中无权千万别讲哲学。首先，我被指控诬蔑马列主义，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在批斗会上，一些人质问我是不是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是对立的统一；没有马列主义就没有修正主义，同样，没有修正主义也就没有马列主义”？对此我供认不讳，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可是竟然激起“民愤”，有人指着我的鼻子吼叫：“你这是披着哲学的外衣，诬蔑马列主义！”“照你这么讲，修正主义同马列主义就平起平坐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训团长亲自斥问：“你是不是说，马列主义会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也会产生马列主义呢？”我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讲矛盾的任何一方失去对立面，就……”“不许狡辩！”我的典型的正统观点还没讲出来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于是，“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场颇呈热烈。但我还在默默地想：胜利者的悲哀，就是因为他没有了对手，也就不再是英雄了。

我的第二条罪状，是攻击和丑化矛盾论。不错，我确曾在教师学习会上讲过：“普遍联系”和“差别就是矛盾”这两个概念，更多的是适用于社会现象，而自然界有些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如鸡蛋和石头有什么联系？它们之间虽有差别但无矛盾。虽然鸡蛋和石头共处于一个地球上，各自占有一定的空间，但它们老死不相往来，是没有任何矛盾可言的，有谁听说过鸡蛋和石头开展过辩论，或者彼此宣战争夺领地的事？驴唇就是不对马嘴，关公大战秦琼也只能从相声里听到。够了，凭这些谬论还不能构成丑化和攻击矛盾论的罪名吗？一些人说我“同伟大领袖唱对台戏”，“胆敢以卵击石（呵，果然鸡蛋与石头有着尖锐矛盾），是可忍，孰不可忍！”“喷气式”的待遇是情理中的了。但是，鸡蛋和石头究竟有什么矛盾，

谁也未涉一词，包括某训团长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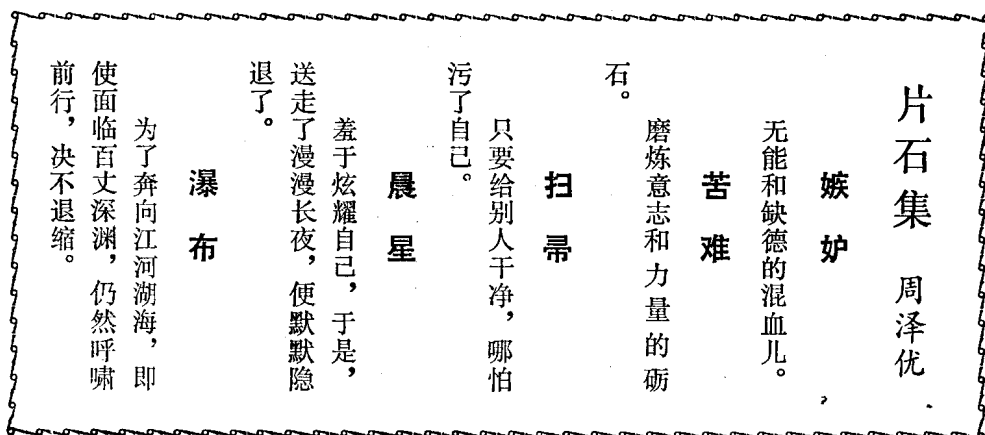
第三条罪状更加怕人：攻击红太阳，美化蒋光头。因为我讲过，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任何例外。当即有人问：毛泽东思想是否一分为二？蒋介石是否一分为二？我说都应该一分为二，在辩证法面前一律平等。一分为二具有不同的性质、范围、角度和方式，它不只限于好和坏、正确与错误、革命和反革命，如阳电和阴电、正数和负数等等都是。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发展过程，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也就是一分为二；蒋介石屠杀人民，但又教育和锻炼了人民，这难道不是一分为二吗？不得了，闯下大祸！斗了我十多场。最精彩的是某训团长的一次发言……结论是：

“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唯独对红太阳和蒋光头不准一分为二！”据说，这就是“哲学为政治服务”。可怜的哲学，在当时当地，竟成了任一些人蹂躏的娼妓！

第四条罪状，是鼓吹“共产共妻”！开始时我感到愕然，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心里想，我虽然反对“三从四德”，赞成寡妇再嫁，可是从没有想到“共妻”（“共产”我是想着的，否则就不是共产党人了），因为我还懂得“妻”不是生产资料，是不能“共”的。听了政治科组的代表揭发，我才恍然大悟，原

来有一次我参加政治科组备课，曾发过这样一些议论：“一个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但是一旦时过境迁，就会变成不合理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由高贵变成不高贵。家庭关系的演进，就是从杂交到群婚，从群婚到配偶，从配偶到一夫一妻制，它们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合理的。现行的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共产主义它肯定会被更合理的婚姻制度所取代。”这同“共妻”有何相同之点？但是竟被“引申”为“反对一夫一妻制，鼓吹共产共妻”了。我辩解说，这个观点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可以找到。一位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教师当即挺身而出，说他读过这篇著作，绝对没有共产共妻的意思。于是，一些人义愤填膺地唾骂：“真没想到身为中学校长，竟然鼓吹共产共妻，太卑鄙无耻了！”“打倒……”

仁者见山，智者见水。鲁迅说得好，不同的人看《红楼梦》就会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呢，曾经在哲学中只看见糊涂！然而，这已成为过去了。单这一点，我就已感到非常幸福，大有希望的了。



我的爸爸董必武

董楚青



我的爸爸董必武去世后不久，许多人来看望妈妈和我们，表示了我爸爸的深切怀念和敬意之后，还希望我们写点什么，介绍爸爸的生平事迹。把我爸爸的忆念写成文章，这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是决不可能的。尽管我和哥哥良羽、弟弟良翻都有写一写爸爸的愿望，但那时也仅仅是愿望而已。

我曾想过，把我所知道的爸爸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某些侧面记下来，包括那些看来很琐碎的，然而却是真实的一些事。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尽可能如实地记下一个老共产党人、我的父亲董必武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侧面。这个萦绕于心头的愿望，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一直在强烈地冲击着我。我也曾陆续写出和发表过几篇零星的回忆爸爸的文章和读爸爸诗词的随笔。一些人读过后，表示有些遗憾，托人转告我说：“文章里没有写出路线斗争，没有反映出重大问题。写得不深刻。”这些批评意见，我不能说不对。但我所知道的爸爸的一些事情的确十分普通，我的写作水平又不高，我怎样能写出路线斗争？写得深刻呢？我只好搁笔。

事有凑巧。这次我从北京南行，到江苏镇江参加全国大型文学丛刊编辑座谈会，遇到与会的广州《随笔》的编辑，他鼓励、帮助、支持我，一定要好好写一写爸爸。他说：“小董，你就写一写董老的日常生活，写他老人家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音容笑貌，待人处事；写你自己知道的有关董老的一切事和物吧。”这正

符合我的心愿，我便贸然答应了下来，就开始写吧。

铺开稿纸，我又不免忐忑不安：纷纷杂杂的一切往事，我得理出个头绪来呀！从哪儿先扯出一条线来呢？这条线能勾画得出我心中的爸爸的样子吗？

我想着想着，又有点不自信了，但“试试写一写吧”的念头鼓舞着我。就在我们座谈会期间，开始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讯，这是一桩意义深远、激奋人心的历史性事件。就从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记下我对爸爸的回忆和怀念吧。

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夏初，掀开了中华民族十年灾难史的一页。哪一个人，包括大陆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谁能幸免于难呢？按理，我的八十高龄的爸爸已经多年不从事具体工作了，对那伙权欲熏心的人来说也没有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是打算放过他。我想，仅这一点，除了恰恰说明爸爸与人民，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共命运以外，还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反对并与之争斗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一批领导人。他们这伙野心家、阴谋家仇视和与之争斗的是一代政权，一种思想，一个数百万人为之牺牲、奋斗了几十年，今天已为亿万人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接到妈妈从他们的休养地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妈妈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去投案、自首。